

# 开

中国修辞学会 2000 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学会成立 20 周年纪念大会

## 幕词

● 王德春

各位先生、各位代表：

今天，大家不远千里而来，欢聚一堂，隆重庆祝中国修辞学会成立 20 周年，并举行空前盛大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广州的天气十分炎热，但大家的热情更高，欢声笑语不绝于耳。150 位代表来自祖国内地、台湾、香港、澳门各地区，来自美国、日本等国家，带来了研究成果，以文会友；带来了对中国修辞学会的深情厚意。

我作为主人，首先代表学会欢迎大家与会，你们能够参加会议就是对学会的支

持；我作为客人，又要代表大家向东道主暨南大学等校领导和广东的会员表示感谢，他们劳苦功高，筹办了这次盛会。今年是学会成立 20 周年，黎运汉副会长刚才已代表常务理事会向为学会做过贡献的会员表示敬意。的确，学会 20 年来取得的成就是与广大会员的努力分不开的。我们忘不了为学会成立、发展、兴旺发达做过贡献的会员。

修辞研究有悠久的历史，源远流长。中国古代的锤词炼句、诗眼文心，古希腊的演讲术、论辩术都在修饰文辞方面下过功夫。20 世纪初叶，欧亚各国学者又整理、研究了各语言的辞格 (figures of speech)，取得很大成绩。词句修辞和辞格成为传统修辞学的主要内容。20 世纪中叶开始，欧亚美各国学者对语境、语体等问题做了不少研究，使修辞研究跨入言语领域。在这几个阶段，中国语言学家与各国学者一起，为修辞学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20 世纪 80 年代，现代修辞学蓬勃发展。1980 年中国修辞学会的成立以及广大会员的学术研究，对这一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在这一阶段，修辞学除继续研究语言体系中的修辞手段外，更以言语环境为基础，研究言语规律，研究语用，研究适应各种语境类型的语体、研究各种社会人及其作品的言语风格，研究言语修养和语言美。修辞学除继续研究语言规范及其有效使用，也研究对规范的偏离及言语创新；既研究词语选择和锤炼，又研究话语建构和理解。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修辞学蓬勃发展之势有增无减，其显著标志是一些修辞学科逐步形成，如信息修辞学、社会心理修辞学、言语交际和公关修辞学、艺术修辞学等。中国修辞学会成立 20 年来的学术活动，广大会员 20 年来的学术研究伴随着，推动着现代修辞学 20 年的蓬勃发展。这是我们今天庆祝学会成立 20 周年最值得高兴的事。

现在，全人类已进入新的 21 世纪，中国修辞学会也进入第 21 年，进入第三个 10 年。在这个新的阶段，广大会员除继续进

行修辞理论研究外，还可在修辞理论的应用方面做些研究。首先，促进信息交流，使社会信息畅通。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社会充满信息流，社会信息的广泛而畅通无阻的交流，是社会进步的标志。语言是社会信息的主要载体。我在天津会议时说过：“无翼而飞者，语言也。修辞使语言飞得更高、更远。”语言承载的社会信息飞向全世界，修辞使信息传送更快、更有效，让信息深入人心。其次，提高全民言语修养，增强人的社会能力。语言和话语承载的社会信息，不一定成为听读者的知识财富；说写者也不一定能够建构适切的话语，有效地传递信息。要使社会信息畅通，必须提高全民的言语修养，让大家具备建构适切话语，有效传递信息的能力，捕捉话语信息核心的能力。这种言语能力是现代人的重要社会能力。再次，提高各领域的语言使用水平，进而提高工作效率。语言使用者除遵守全民语言体系的规范和全民语言的语体规律之外，还要熟悉各领域使用语言的特点，所谓“三句话不离本行”。在外交、军事、法律、教育、医疗、商业等领域结合使用语言的特点，普遍提高语言水平，其工作效率就会相应提高。我们修辞学会和广大会员在这三个方面有很多问题可研究，有许多工作可做。当然，我们的研究和工作的不局限于这三个方面。每个人都可根据自己的特长、基础和兴趣，各自研究自己的问题，然后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多角度地研究语言和修辞，是现代语言学及修辞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我相信，中国修辞学会在新的世纪里会取得更大的新的成就。

发扬优良的学风，是学会取得成绩的保证。中国修辞学会一向倡导“实干、团结、高效”的学风和工作作风。广大会员扎实工作、团结合作、成效显著。1998年天津大型学术研讨会之后，去年在新疆昌吉召开了由常务理事吴士良等筹备的中型学术研讨会。今年正在广州隆重召开由副会长黎运汉、常务理事肖沛雄、理事刘凤玲、曾毅平等筹备的庆祝学会成立20周年的大型学术

研讨会。此外，分别在海口、上海召开了三次由理事彭京宜、姜剑云筹备的小型专题学术研讨会，并成立了以姜剑云、王洁、刘慷贞、彭京宜等理事主持的法律语言研究会。这种大中小型学术会议交错召开，不仅活跃了学术气氛，而且使学会的研究工作更为广泛、深入。天津会议之后，我们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达成协议，出版 21 世纪修辞学丛书，第一部由学会理事李国南撰写的《词汇与辞格》今年底可以问世，这项工作由会员高玲玲具体操作。学会还与平顶山师专学报达成协议，在该学报开办“21 世纪修辞学专栏”，已发表会员文章多篇，此项工作由会员孟建安具体操作。我们还在上海《咬文嚼字》杂志开辟了“法律语言与修辞”专栏。这些工作可进一步推动会员的学术研究。希望会员们介绍更多的出版社、杂志社与我们合作。天津会议之后，顺利地进行了学会秘书处的交接。由原来设在南昌大学，由副会长刘焕辉主持的秘书处转移到云南师范大学，由副会长骆小所主持工作。现在，在会员周芸、杨丽姣等的具体操作下，学会秘书处已正常工作，处理学会日常事务。

学会工作的灵魂在于学术，应围绕学术而展开。这一次的大型会议，也是以学术研讨为主来热烈庆祝学会成立 20 周年，展示 20 年来的学术成果，展望新世纪的学术发展。关于明年的学术活动，预定的中型学术研讨会原委托澳门的理事邓景滨等筹备，现因澳门刚回归祖国，事情甚多，不及安排，我们再另行考虑。另外，委托理事孙汝建筹备在南通召开社会心理修辞学小型学术研讨会，委托理事彭京宜筹备在海口召开法律语言与修辞小型学术研讨会。对上述三次研讨会有兴趣的会员可与筹备人联系，并积极撰写有关论文。特别欢迎会员主动与我们联系，承担筹备学术活动的任务。为了让中国修辞学走向世界，学会还将与外国学者合作，共同开展学术活动。

各位代表，让我们充分利用东道主提供的条件，积极开展学

术研讨，以文会友，团结合作，开好这次大会。当然，希望大家谈得愉快，玩得开心。谢谢大家。

（中国修辞学会会长、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 一、修辞



## 言

——兼论修辞与文化的  
关系及跨学科研究问题

## 外之意面面观

● 刘焕辉

20年前，中国修辞学会在武昌举行成立大会时，收到语言学家朱星先生一首热情洋溢的贺诗<sup>①</sup>。其中有两句很值得玩味：“不谈文法言中义，要探修辞弦外音。”修辞学的研究范围当然不限于此，但可以肯定：出现于话语或文本中的言外之意现象，必定是修辞活动的产物。故从古至今一直引得许多研究修辞的人寻味探幽，各抒己见。但由于这一现象涉及许多非语言的异质因素，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大都停留于修辞技巧（特别是辞格）的分析与修辞效果的赏析阶段，缺乏集中、系统

的深入探讨。如何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对其作出科学的解释，也许有助于启迪修辞研究的新思路。

## 一、正名和术语的学科定位

其实对言外之意现象感兴趣的远不止修辞学一门学科。哲学、文艺学等人文学科都对它发生过浓厚的兴趣。就语言学的各个分支学科而言，理论语言学、语义学、语用学都不约而同地提到这种现象，称说也不一样。叶蜚声、徐通锵先生主编的《语言学纲要》取吕叔湘先生《语文常谈》中的说法，叫“言内意外”；程雨民先生在《格赖斯的“会话含义”与有关问题的讨论》一文中，把 H.P. Grice 提出的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译作“会话含义”，戚雨村先生在《语用学说略》一文中又把它译作“会话寓意”；石安石先生在《说寓意》这篇语义学论文中赞成戚先生的译法，认为译作“会话寓意”更确切，因为汉语中的“含义”一词包含了字面意义，而格赖斯的 *implicature* 则专指“话语所表达的超越字面意义的意义”。可见以上关于“含义”、“寓意”、“言内意外”和修辞学、文学称说的“言外之意、言不尽意、意在言外”以及“弦外之音、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等含义，指的都是同一现象。站在修辞学立场上，我们尊重习惯用法，仍称作“言外之意”。在此还得作点区别说明：英国语言学家利奇（G. Leech）在《语义学》中也有 *illocutionary force* 之说，被译作“言外之意”，这同我国一贯使用的“言外之意”的含义不同，因为它是从若干语用预设中推导出来的意义——按汉语的使用习惯，这种“意义”与其说是“言外之意”，不如说是“言下之意”，此其一；其二，“寓意”包括了“规约寓意”和“临时寓意”，我们认为“规约寓意”已经转化为同一语言社会成员所通用的一种固定意义了，我们称之为“语义义”，以区别于“言语

义”。故本文所要讨论的仅限于“临时寓义”范围，《现代汉语词典》对这个词条的解释也是取此含义的。这是我们对“言外之意”在本文中所作的学科定位，以便把修辞学对这一现象的讨论同哲学、文艺学及语言学其他分支学科对同一现象的研究区别开来。由此可以从中获得某种方法论的启示：同一客观对象，可以从不同角度、采用不同方法去研究它。我们抓住“言外之意”这一复杂的修辞现象作一番理论和方法的思考，指望能为中国修辞学走向新世纪多提供一个新视角。

## 二、言外可以寓“意”是语言符号优于人类其他符号的重要特征

“意”可寓于“言外”，是语言符号区别于人类社会其他符号及动物信号的最本质特征，研究以语言文字为能事的修辞现象的修辞学更值得深入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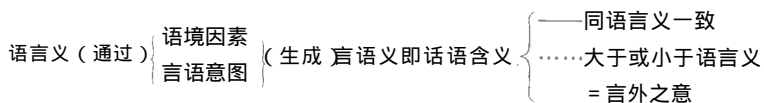
语言符号之所以能够充当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不仅由于它具有任意性、线条性以及可以重复使用、自由拆卸和逐层组装等特征，这些都是就语言符号系统的结构特点而言的，这些特征用以区别人类社会约定的各种符号（包括语言符号）与动物信号是可行的，但就语言符号与其他符号相比较而言，其中有些特征别的符号也有。比如化学元素符号，国际通用拉丁字母来表示：氧元素用 O、氢元素用 H、氯元素用 Cl、钠元素用 Na 等等，这在创造这些元素符号时也是任意的；这些符号也具有灵活拆装的特点，如：H O 可组成最简单的“氢氧化合物”（水）的分子式，NaCl 可以组成“氯化钠”（盐）的分子式，NaOH 又可组成“氢氧化钠”（碱）的分子式；又比如乐谱中表示音长或音高的音符，五线谱用空心或实心小椭圆形和特定附加符号表示，简谱用“1、2、3、4、5、6、7”，七个阿拉伯数字和特定附加符号来

表示，并用这些有限的音符排列组合成无限美妙的乐章；数学、逻辑学等其他学科领域的符号也都有类似情形。但这些符号的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即符号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是规定死了的，二者之间都具有——对应的明确单义性。语言符号则不然，其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虽然也是约定俗成、彼此通用的，但在进入使用后，又具有灵活变通的特点。维特根斯坦（L. Wittgenstein）关于“词的意义在于用法”这句哲理名言，多少触及了这一特点。因此要进一步揭示语言符号同其他符号的本质区别，还得从语词的多义性及其组成话语进入交际后语义的共时变化来揭示其反映人类心智的本质特征。综观人类的言语交际活动，除科学专著和正式公文或法律条文以外，人们在日常交谈中，谁也不会把要表达的意思完全局限于字面意义；而对方只要不是傻瓜，更不致停留于字面意义的理解。如：“今天我身体不舒服”的言外之意是“不能赴约”，对方听后既不生气也不强求；“时间不早了”的言外之意是“不能奉陪”，对方听后既不失体面，又能自动告退……总之，都是把想说的意思委婉地寓于言辞以外，使组成话语的语言（如汉语）能超越字面意义，人们完全可以凭借这种意义的“超载”曲尽其意，彼此沟通。其他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是不允许这样变通使用的。语言符号的这一使用特点，小至亲友之间的交谈，大至国事交往，都不乏其例。一旦用文学形式表现出来，就更耐人寻味、发人深省了。修辞活动中许多用语言转义形式构成的修辞方式，或目前尚无定名的许多古已有之和新冒出的转义修辞实例，大都含有言外之意。故陈望道先生认为对这类修辞现象“往往只能从情境上去领略它，用情感去感受它，又须从本意或上下文的连贯关系去推究它，不能单看辞头，照辞直解”<sup>②</sup>。但到底怎么“解”，如何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它作出科学的“言传”？这就有待于进一步探究其生成机制了。

### 三、言外之“意”是怎么生成的

不管言外之意如何超越话语的字面意义，又都是依赖于语言义而生发出来的，或者说是以语言义为依托的。抛开语言义为依托，凭意会去空谈言外之意、弦外之音，难保不重蹈传统语文学的旧轨。作为一个语言工作者，应当立足于语言学的科学基地来剖析这一修辞现象。吕叔湘先生在《语文常谈》中论及这一问题时，有一段话说得很概括：“总之，在人们的语言活动中出现的意义是很复杂的。有语言本身的意义，有环境给予语言的意义；在语言本身的意义之中，有字句显示的意义，有字句暗示的意义；在字句显示的意义中，有单字、单词的意义，有语法结构的意义。这种情况，从前人也都知道，所以才有‘言不尽意’，‘意在言外’，‘求之于字里行间’这些个话。”其中“语言所暗示的意义”实际上已超出了“语言义”，无法“单看辞头，照辞直解”；至于“环境所给予语言的意义”则更是如此。因此他接着提醒人们：“语言的确是一种奇妙的、神通广大的工具，可又是一种不保险的工具。听话的人的了解和说话的人的意思不完全相符，甚至完全不相符的情形是常常会发生的。语言的地面坎坷不平，‘过往行人，小心在意’。”这对我们探讨修辞活动中出现的“言外之意”现象很有启发。为什么在言语交际活动中会出现“听话的人的了解和说话的人的意思不完全相符，甚至完全不相符的情形”呢？问题不在或主要不在语言义这个层面，而在对语境因素的把握。言语交际的实践证明，同一句话在不同语境出现，其含义是不一样的，有时在词句的原义基础上扩大或缩小所指范围，临时增添或减少点什么；有时又转化为一种同原义毫不相干的意义；有时竟变得跟原义完全相反。语境带给语义的这些影响，说明语境对语义既具有生成和转化功能，同时还具有帮助

人们感知和理解话语的解释功能。那么，语境因素又是怎样影响话语含义的呢？对于这个问题，不仅修辞学和语用学正在探究，就是语义学也注意到了，石安石先生对此就作过中肯的论述<sup>③</sup>。但对修辞学和语用学而言，仅仅满足于认识到语境这一要素是不够的，不管是采用“语境关联说”还是“语境适应说”，都不能完全解开这个谜。人们的言语活动（包括修辞活动）的事实明摆着：在相同语境中，同一句话由不同的人说出，意思不完全相同甚至完全不同，即使出自同一个人之口，不同对象听来其意思也大不一样甚至完全相反；所谓“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或“言者有意，听者无心”，“言者意在此而听者误以为彼”等偏离话语原意的现象都时有发生。这又进一步证明，言外之“意”的生成还不止于语言符号同语境因素的相互作用，还渗透着说话人和听话人的主观因素。就说话人的主观因素而言，主要是言语意图的渗入，致使同一句话在相同语境中出自不同人之口意思不完全相同甚至完全不同；就听话人的主观因素而言，主要是各人的认知结构（cognitive structure）不同，导致对同一个人在同一语境中说出的同一句话理解大不一样甚至完全相反。现在仍从说话人角度来考察这言外之“意”的生成。由于这“意”之产生与说话人的言语意图密切相关，更确切地说，它是言语意图和语境因素同时作用于话语字面意义的结果，因此言外之“意”的生成过程可大致表述为：语言义（词汇意义+语法意义）→言语意义+语境意义+言语意图=言外之意。这样图示，仅仅标明言外之“意”所构成的基本要素，还未能揭示这些要素之间的层次关系究竟怎样。为此，我们还得进一步作如下的图示：



上图所示表明：作为修辞活动的成品（话语），其语言义（包括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是同时接受“语境因素”和“言语意图”这两大基本要素的影响而生成话语含义的。当话语含义跟字面意义（即语言义）相一致时，不存在什么言外之“意”，故用实线连接，表明是直接用语言义来体现的；当话语含义大于或小于其字面意义（即语言义）时，言外之“意”便由此而产生了，故用虚线连接，表明因渗入其他非语言因素而发生转义现象。由此不难看出语境因素和言语意图这两大要素对于言外之“意”的生成所起的作用无法从语言本身的线性序列中获得解释。那么，这两大要素又是怎样作用于话语，把语言义转化为“言外”之“意”的呢？这就不得不从深层次上来探究语言符号进入使用后是如何由语言义转化为言语义的内在原因了。

原来语言这套符号系统绝非纯客观的静止物，它是不能脱离人和一定社会文化而孤立存在的。萨丕尔（E. Sapir）关于“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这一独到见解，从人类语言学角度揭示了语言和人类社会文化的内在联系<sup>④</sup>；赵元任关于语言“是一种自主的、有意识的行为”的论述，则强调了说话人的意识对语言的作用，并把它当作语言的第一个特征突显出来<sup>⑤</sup>；吕叔湘关于“语言不存在于真空”的论断，又从动态研究的角度强调了语言不能脱离人们的使用而存在<sup>⑥</sup>……总之，都启示我们不能浮在语言符号的表层来寻求言外之“意”的生成机制，仅从符号与符号的排列组合中考察语言义到言语义的转化过程。这里的关键是：“义”与“意”不是同质的东西，“义”存在于语言符号和符号序列（加入语法意义）之中，包括“语言义”及其在使用中具体化了的“言语义”，这种言语义在接受语境和言语意图的影响后并未发生语义的变化，故仍可同字面意义保持一致；而“言外之意”的“意”，则因说话人的言语意图另有所指，特将这种“用意”注入具体语境中的语言义，将其转化为一种“情境意义”

了。这种“情境意义”带有浓厚的民族文化色彩，交际双方若不具备相同或相近的文化背景知识，是无法互相沟通的。这说明“言外之意”的背后隐藏着说话人的意图和一定社会文化在起支配作用。故听话人对言外之“意”的理解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认知结构。修辞活动中许多委婉含蓄的表达方式之所以独具魅力，获得最佳交际效果，就因为表达者充分利用了听众和读者所共有的社会认知（social cognition），可以通过这些已经发生转义的话语形式体味到它的言外之“意”。《天安门诗抄》中许多悼念周恩来总理、怒斥“四人帮”的委婉诗篇之所以能激起广大群众的思想感情共鸣，就因为大家都具有这种社会认知；反之，若不具备这种认知，则无法体味到诗中的言外之意了，何谈思想感情共鸣！再看被张也唱红的《走进新时代》这首歌的几句歌词：“我们歌唱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了新时代。”如不了解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率领中国人民翻身求解放、实行改革开放、意气风发奔向 21 世纪这段历史，不具备这种社会认知，谁知道是指什么意思！心理学家们说得好，谁知道的东西越多，谁就能读懂、听懂更多。这就不难理解上述吕叔湘关于听话人的理解与说话人的意思何以不一样的奥妙了。我们这里是探讨言外之“意”的生成机制，至于如何揭示听、读者认知这“意”的心理机制，得涉及皮亚杰（J. Piaget）的“图式”（Schema）理论，拙文《言与意之谜的语言学求解》<sup>⑦</sup>、《关于当代语义学跨学科研究的思考》<sup>⑧</sup>曾对此作过初步探讨，此处不再赘述。

#### 四、关于“言外之意”的研究方法思考

言外之意现象，是哲学、人类学、文化学、民俗学、社会心

理学、特别是语言学和文艺学等人文学科都曾探讨过的一个传统课题，却又是久攻不下的一道难题。借用吕叔湘在《语文常谈》中的话来说：“这个问题很不容易谈好，可是谈还得试着谈谈。”语言学以外的其他学科就不去说了，这里先就修辞学和与之关系最密切的语用学及语义学的研究现状作一简略回顾，然后重点就修辞学对这一现象的研究方法作些初步思考。

如前所述，修辞学界目前对它的研究还不够集中，大都停留于修辞技巧及其效果的分析阶段，较多分散在辞格的赏析中，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还不能科学地说明其从语言义到言外之意的生成过程。语用学界不少学者曾试图从格赖斯的理论中引进“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来解开这道难题，即当会话违反了“合作原则”中的四条准则之一，出现表面不合作的情况时，便意识到言外另有寓意了。这虽然也能说出一些道道儿，但总给人以隔靴搔痒之感，跟汉语特点和汉语言学的学术传统总隔着点儿什么，不能揭示这言外之“意”是怎么生成的，更不能提供如何着手分析的操作方法。后来新起的一些语用学理论，比如何自然先生介绍的“关联理论”、“顺应理论”，我们了解不多，不敢妄加评说。从何先生所介绍的要点来看，对修辞学研究也有颇多启迪，但主要不是针对“言外之意”的研究来介绍的，当然不应苛求能提供一剂解释这一现象的良方。语义学自然是研究语义的。传统语义学的研究对象是词义；现代语义学中的结构语义学和生成语义学所研究的，也还在语言义范围；认知语义学虽然会涉及言语义及与本题有关的问题，但迄今还未能找到一种可操作的方法能对此作出科学的“言传”。看来，方法论问题已成为修辞学解开这道难题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本文试图摆脱描写语言学及受其影响的修辞学的研究范式，从跨学科研究的角度，为揭示“言外之意”这一特殊现象的奥秘，探寻一条科学分析与人文思考相结合的路子。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方法拼凑在一起是